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间问题

孟昭信

一、问　题　缘　起

康熙帝为了抗击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进犯，先后四次出塞：1、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七月，进至博洛和屯（今河北隆化县城）；2、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春，出师漠北；3、同年九月，鄂尔多斯之行；4、康熙三十六年（1631）二月，亲临宁夏。这四次出塞，如果我们笼统地说成四次亲征未为不可，只因康熙本人坚持“三次亲征”之说，且历来都沿用这一提法，所以我们必须仅仅认定其中的三次为“亲征”，而否定另外一次。

倾向性的看法，认为四次中的第一、二、四次为亲征，目前所见到的清史专著、论文、教材，绝大部分持此说。另一种看法，则认为四次中的第二、三、四次为亲征。例如，闻性真同志在《康熙与自然科学》一文中说：康熙帝“在征讨噶尔丹之役中，曾三次亲临前线指挥，第一次是三十五年春出独石口，大军至克鲁伦河，然后经归化班师。第二次在同年九月，他复至归化，驻跸鄂尔多斯。第三次是三十六年春，取道宁夏，因得噶尔丹自杀消息，未出征而还”①。这所说“未出征而还”，当指康熙在宁夏派出的两路捣巢之师，闻讯撤回，并非否认康熙第三次亲临前线、

以上两说对二、四两次出塞，看法一致，都认定是亲征。主要分歧在于，对一、三两次出塞看法不同，前说否定第三次，后说否定第一次。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。下边先对第一次出塞、即乌兰布通之战略加分析，看看到底是否是亲征。

二、乌兰布通之战不是亲征

康熙第一次出塞是为了指挥和部署乌兰布通之战。将这次出塞看成亲征之说源于魏源的《圣武记》。该书卷三《康熙亲征准噶尔记》载：康熙二十九年，“圣祖以噶尔丹势炽，既入犯，其志不在小，且喀尔喀不可使无故地游牧也。六月，集大臣于朝，下诏亲征”。魏源还概述康熙三次亲征出塞路线：“一由东路，再由中路，三由西路。东路由博洛和屯，仅在盛京西界，而准夷已内越乌（朱）穆秦而南，故未度漠出边”。可见，这第一次亲征的“东路”，即指康熙第一次出塞，进至博洛和屯而言。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》沿袭魏源之说，写道：二十九年七月“癸卯，上亲征，发京师”。

查《圣祖实录》康熙二十九年六月辛巳（二十二日）条记载：康熙帝得知噶尔丹气势汹汹，经过外蒙，侵入内蒙，当即“谕兵部：噶尔丹追喀尔喀已进汛界，朕将亲往视师。从征诸王出喜峰口，公苏努所领之军随朕行”。并谕议政王大臣等，“前所拔每佐领护军二名，初一日先发；诸王率每佐领骁骑一名，于初四日继发；朕于初六日启行”②。从这一布局看，皇帝自领一路大军，亲临前线视师，诸王处于“从征”地位，确实是准备亲征。魏源据这一条记载，说“六月，集大臣于朝，下诏亲征”，似乎并没有错。问题是几天之后，伴随

形势的发展，康熙的态度有所变化，并未按原定计划执行。

七月初二日，康熙任命皇兄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，皇长子允禔副之，出古北口；皇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，和硕简亲王雅布、多罗信郡王鄂扎副之，出喜峰口。两路都任命大将军，已看不出亲征之意向。到七月六日，由京师启行的也不是皇帝圣驾，而是接受皇帝敕印帅师北征的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等人。此即康熙后来所说："朕命裕亲王及皇长子率师往剿"，或说："授钺亲王大臣，问罪声讨"③。其含义，已与"亲征"迥然不同。《圣祖御制文二集》卷四十四，记有出征当时康熙赐福全等诗一首，标题是《命裕亲王福全皇长子胤(后改为允)禔帅师征厄鲁特锡之以诗》。诗中有："亲藩分铁钺，长子拥麾旌"；"遐荒安一体，归奏慰予情"之句。这也表明当时不是"亲征"，而是"命将出征"。

康熙虽然没有亲征，确也并未安坐后方，而是在福全等人出发几天之后，于七月十四(癸卯)日，以"巡幸边塞"为名，启程北上，试图进至临近前线之处，对即将爆发的反击战，起到实际的指挥与决策作用。康熙为何原准备亲征，后又改变主意？史书无明文记载。可能出于策略考虑。清军于六月二十一日在乌尔会河初战失利，噶尔丹气焰嚣张，大举深入。消息传来，康熙帝决定将计就计，一举全歼灭入侵之敌。如果仍旧皇帝亲征之名出师，声势浩大，容易将敌人吓跑，而由皇兄、皇子出面，借口前去与其谈判，稳住敌人，康熙于幕后调兵遣将，决策进取，则便于将其全歼。如果这一目的实现，此次北巡虽无亲征之名，仍不失为一次实际上的亲征。

然而事与愿违，康熙帝于七月十四日出发后，十八日刚出古北口便"圣躬违和"。带病坚持继续前进，于二十日到达距裕亲王福全仅三百里的博洛和屯，立而整饬驿站，建立直达军前的通讯系统，有意在此掌握军情，指挥前线之战事。但因过度劳累，至二十二日夜，病情突然加重，发起高烧，"身热心烦"，彻夜未眠，直至黎明，"始得成寐"。诸大臣、侍卫惶惧不安，于二十三日一再合词恳请圣驾回銮。康熙也感到"此地寒燠不常，似难调摄"，同意"暂且回銮"。但想到即将离开前线更远，心情十分痛苦，流着热泪对扈从诸臣、侍卫说："朕来此地，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，以清沙漠。今以朕躬抱疾，实难支撑，不获亲灭此贼，甚为可恨"④，随命选择肥壮马匹，分给随驾火器营兵、前锋护军，令其驰赴大军前。至此，康熙因病魔缠身，不得不放弃对这次战役幕后指挥的设想，而将指挥全权委托给皇兄与皇长子。

乌兰布通之战不仅不是亲征，甚至在关键时刻，大将军福全亦未能按皇帝意图行事。八月初一日，清军在福全指挥下，经过艰苦鏖战，付出巨大牺牲，击败噶尔丹，将其围困于乌兰布通山顶峰。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？康熙于回京途中，八月三日行至石匣，接到福全奏疏，知首战告捷，"不胜欣悦"，但甚为担心王大臣等滋长怯战与麻痹情绪，使征剿半途而废，遂降谕重申歼敌务尽的思想，明确指出："此后当何以穷其根株，平其余党，熟筹始末，一举永清，勿留余孽，尔等其详议以闻"。然而，福全不待皇帝谕旨，竟于八月二日，以"使我将士暂息"为名，放缓对乌兰布通山的围攻；八月四日，又接受噶尔丹所派西藏喇嘛济隆所提"休征罢战"的无理要求，下令各路一律停止进击。

《圣祖仁皇帝平定朔漠方略》对此事记载较《实录》为详。福全在四日与济隆会谈时答复说："许汝所请，当各发印文一道，与各路领军诸王大臣，汝执此往，不论遇何路军兵，即令送本路王及大臣，即止不击也"。说完，"付以墩康亲王、土谢图亲王、达尔汉亲王、

内大臣苏尔达、都统额黑讷、副都统马席印文各一道”。给噶尔丹开了安全通行证，并赏赐济隆师徒大批财物。康熙览奏后，降旨斥福全失误机宜之罪，令其待内大臣苏尔达等所率军队到达，即作速进剿，并痛心地说："若又失机会不进逼之，王与大臣此行何所事事耶？"⑤然已无济于事。

噶尔丹见清军停止战斗，乘隙从西喇木伦河涉水，横度大蹟山（西沙窝子），连夜遁走于冈爱泊，向北逃窜。当时内大臣苏尔达、科尔沁亲王沙津、班第等所率之科尔沁、盛京、乌喇联军，已如康熙预料如期到达达里泊，正好邀击，只因接到福全“暂止勿击”之令，致使顽敌宵遁。

康熙对乌兰布通之战的结果甚为不满，认为指挥不利，大臣怯懦，虽击败噶尔丹，竟不乘胜穷追，以至“未获全剿”。他吸取这一次沉痛教训，用几年时间训练军旅，咨访形势，决心亲自率军前往征剿。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初九日，他在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》中回顾："方亲征之初举也，在廷诸臣多持异议，……不知除恶务尽，制胜在谋。历观汉唐宋之已事，往往罢敝中国之力，而不能成廓清边塞之功，良由经理失宜歼除之不早也。朕既远鉴前辙，复追维乌兰布通之失，故不避寒暑艰辛，亲莅穷边，三勤薄伐”⑥。可见，乌兰布通之战虽非亲征，确是后来三次亲征的前奏与导因。

三、亲征的标志和依据

既然排除第一次出塞，另外三次必是亲征。但其中康熙三十五年秋的鄂尔多斯之行，过去不大为人注意，认识也不一致，所以仍有必要对后三次出塞进行总体分析，以弄清到底是不是亲征。

亲征与命将出征不同，皇帝不是幕后遥控，而是身兼最高统帅，躬统六师，亲临前线，处处强调一个“亲”字。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十七日，汉大学士、九卿、科道等官，见皇帝部署三路出师，中路主力部队一直未任命统帅，便猜测皇帝有意亲征，于是上疏劝阻，奏请“特简中路大将军一人，令统大兵，与诸路并剿”，皇帝可以“驻跸近边，指授方略”。康熙览奏，不为所动，降旨申明亲征之决心："向者乌兰布通之役，……乃竟中贼计，致噶尔丹遁走。彼时因朕躬违和，未得亲至其地，失此机会，至今尤以为憾。噶尔丹窜伏巴颜乌兰地方，相距未甚辽远，以是不惮勤劳，亲莅边外，相机行事”⑦。

行军途中，亲自处理各种事务。例如，他见行李运送迟缓，军士不能及时安营，便每日五更即起，亲自督促运送士兵行李，使行李先至营地，“士马大得苏息”。此外，他还亲自派人探听敌情、分析形势，“亲自巡察”军中的斥堠哨望，亲自调动、检阅军伍，亲自决策会兵日期及歼敌方式，甚至“躬率前锋兵”，沿克鲁伦河追击敌人。此后的两次出塞，也都具有皇帝亲临前线、亲自调度和指挥一切的特点。康熙自己总结说："塞外情形不可臆度，必身历其境，乃有确见”。正因亲历前线，洞悉情形，所以遣发官兵数道围困，皆能扼贼要害。另外，“调军、转饷，必一人兼综其成，事乃有济”⑧。显示亲征具有无比的优越性。

亲征次数多少，由全歼噶尔丹的战斗目标所决定。在不到两年时间，一连三次亲征，有歼敌务尽一气哈成之意。因此，三次亲征乃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，各有具体任务，缺一不可。以康熙三十五年九月鄂尔多斯之行为例，刚开始准备时，康熙为防止官员劝阻，只说去口外试鹰，所以不大为人注意。直到九月十五日（启程前两天），宣布："此番出兵，

八旗官员及兵丁人等，俱照今年（春季）出征例，给两月行粮；如前已出兵，这次又往，各赏银十两”⑨，才透露此行不是普通行围，而是一次非比寻常的“出兵”。

这次亲征目的是：“收抚其降众，遏绝其外援”。后来事实证明，这一目的全部达到。康熙亲临前线，能及时了解情况并采取对策。十月中下旬，驻于归化城（今呼和浩特），他得知噶尔丹可能窜犯哈密，立即檄令孙思克及西安将军博霁，分别率兵赴肃州阿南达处，加强警戒，一旦发现敌人踪迹，“即行剿灭”⑩。阿南达遵谕，争取逃向哈密的噶尔丹内弟噶尔亶多尔济重新归附清朝，令其与回部头人达尔汉白克互相配合，于滩纳泰、都尔白儿济各口，“拨人小心驻防哨探”。康熙还另派人征调土尔扈特部阿玉奇台吉、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、和硕特部额尔克巴图尔台吉，各发兵一千，“俱令集于阿尔台（即阿尔泰）以内土鲁图地方驻札，四面设哨，如遇噶尔丹即执而杀之，如或生擒，即行解送”⑪。如此处处设防，加上派驻之清兵，便从根本上遏制了噶尔丹窜往青海和西藏的通道，不仅迫使他的部下纷纷投降，甚至他的独生子塞卜滕巴尔珠尔，途经哈密附近时也被擒获，使其更加陷于孤立无援之绝境。

这次亲征不仅巩固和扩展了同年春夏间第一次亲征的成果，并为翌年春季的第三次亲征最后消灭噶尔丹，乃至解决青海问题做了极为必要的准备。康熙后来对臣下讲到连续亲征的意义时指出：“若非朕亲统大军追袭噶尔丹，使少留余息，彼必复聚，难以遽灭矣”⑫。

亲征与命将出征在礼仪上也有严格区别。查《雍正会典》，将乌兰布通之战列入“命将出征”，而将其后的三次出塞，详细载入“圣驾亲征”和“亲征凯旋”项下。

康熙三十五年春，因系首次亲征，仪式极为隆重。“钦天监择于二月丙辰（三十日）启行。前期三日，遣内大臣等告祭天坛、地坛、宗庙、社稷坛、太岁坛，颁行军律令。至日，遣官致祭道路、火炮之神”，并亲率从征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等，诣堂子行礼，祭旗纛之神。其旗纛，除八旗护军纛、火器营纛各八面之外，还特设黄龙大纛。銮仪卫陈卤簿，自午门设至堂子，又从堂子设至郊外，并配有海螺、画角等各种乐队及礼炮，声势空前壮观。康熙由安定门大街至陈兵处，随征“官兵皆于马上俯伏，候驾过方起。……俟驾行后，官兵各整队伍，相随进发”。

三十五年九月的出塞，虽出征礼仪不及上一次隆重，《清会典》仍确认为“亲征”，并在“圣驾亲征”项下记其事迹及经过：“是年九月，噶尔丹败遁后，收集散亡，复图侵掠。大将军报至，圣祖仁皇帝亲巡行北边，经理军务。……钦天监择定军行日期，左翼于十七日起程，右翼于十八日起程，至十九日驾发京师”。关于最后一次亲征，《清会典》写道：“三十六年，圣祖仁皇帝三举北征，仍分两路出师，……二月初六日启行，陈设卤簿，由神武门出德胜门”⑬。

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》虽据《圣武记》将康熙二十九年的北巡说成是“亲征”，但该书《礼志九·军礼·亲征》项下，确与《清会典》一样，没有记载有关这次北巡的任何礼仪，而将其后的三次出师，当成“亲征”，详加记载⑭。可见，礼仪也是认定亲征的有力佐证之一。

我们再从康熙本人的言论，看看他自己是怎样认定的。康熙于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刚从宁夏返回北京，即谕大学士及九卿等：“昔（三十五年春）朕欲亲征噶尔丹，众皆劝阻，惟伯费扬古言其当讨。后两次出师，皆朕独断”⑮。是康熙已将三十五年春及其以后的两次出师，算成三次亲征。

同年七月十九日，康熙帝以平定朔漠并太和殿告成，颁诏天下，简述三次亲征经 ："朕思此寇包藏祸心，倘不即行扑灭，则异日必缘边设防重滋民困，何如及时声讨立靖根株。于是，昭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，躬统禁旅，不惮勤劳，三出塞外：去年夏，贼踞克鲁伦河，自度力不能抗，仓皇宵遁。朕追至土喇河，适西路大军遮截其后，击败之于昭莫多，贼势大挫；冬月，复驻跸鄂尔多斯，收抚其降众，遏绝其外援，而贼益困蹙；机会所在，刻不可失，遂以今年春西巡边境，从宁夏出塞，遣发大兵，两路进剿，……噶尔丹穷迫已极，一闻大军压境，计无复之，随于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"⑯。

康熙在《剿灭噶尔丹告祭天坛文》中，也述及三次亲征的时间及经过："兹以厄鲁特噶尔丹，荒陬狡寇，肆虐跳梁，怙恶有年，神人共疾。臣用是于丙子（三十五年）春，亲统六师，恭行天讨，越踰瀚海，埽荡贼氛，深入穷追，师徒大捷；于丙子秋，再履边境，经划招徕；于丁丑（三十六年）春，复至朔方，奋扬武略，逆子俘获，丑类革心，凶渠殄亡，边尘尽涤，遐荒番部，罔不归诚"⑰。

康熙的大量言论，都认定除乌兰布通之战外，其他三次出师为亲征。然而《圣祖实录》在极个别地方也有不同之记载。例如，康熙于六十一年（1722）九月初三日，在热河行宫对议政大臣等说："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，不知国家承平虽久，岂可遂忘武备？前噶尔丹攻破喀尔喀，并侵扰我内地扎萨克至乌兰布通，朕亲统大兵征讨，噶尔丹败走。后又侵犯克鲁伦，朕统兵三路并进，，至昭莫多剿灭之。今……我兵直抵西藏，立功绝域，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，勤于训练之所致也。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，惮于劳苦，不加训练，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？尔等诸臣宜咸知之"⑱。纵观全文可知，他这次诫谕，意在强调不忘武备、出口行围、勤于训练的必要性。由于年老体弱、记忆力减退，举例稍欠严谨，并非订正历次所述关于"三次亲征"的概念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经过多方考察，认定康熙三十五年春、同年秋和翌年春的三次出师，为抗击噶尔丹、安定北方和西北边疆具有决定意义的三次亲征。

---

① 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页961—962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。
② 《圣祖实录》卷146，页17、18。
③ 同上书，卷183，页11；卷233，页14。
④ 同上书，卷147，页23。
⑤ 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卷8。台湾影印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册354，页575、576。
⑥ 《圣祖御制文三集》卷20，页4、5。
⑦ 《圣祖实录》卷170，页7、8。
⑧⑫⑮ 同上书，卷183，页23
⑨ 同上书，卷176，页10。
⑩ 同上书，卷177，页8。
⑪ 同上书，卷178，页2。
⑬ 《雍正会典》卷63《圣驾亲征》。光绪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411《礼部·军礼·亲征》将第一亲征时间误记为二月十三日。
⑭ 《清史稿》册10，页2658、2659。
⑯ 《圣祖实录》卷184，页16、17。
⑰ 《圣祖御制文二集》卷41，页10。
⑱ 《圣祖实录》卷299，页1、2。